

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程小强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关键词]张爱玲;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政治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3-0075-08

Doubts and Analysis of Zhu Yuhong’s Individualism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CHENG Xiaoq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anxi 721013, China)

**Abstract:** Zhu Yuhong’s *Individualism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has many misjudgme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n the issue of individualism, Eileen Chang’s novels echo Lu Xun’s novels”, which has no basi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 refuse to answer Xianglinsao’s “soul” question “from the feeling of nothingness caused by loss of faith”, which is Zhu Yuhong and many scholars’ misreading of Lu Xun’s *Blessing* at present. This paper makes a particularly far-fetched judg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ileen Chang’s individualism and politics, because Eileen Chang’s political observation and individualism appeal are in the same line, and there is no “torture” situation. Narcissism, self deception and nihilism are not the distorted psychology of the modern society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Narcissism and self-delusion are the general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nihilism also originates from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It should be said that Zhu Yuhong’s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Individualism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is far from essential.

**Key words:** Eileen Chang; individualism; nihilism; political reality

祝宇红的文章《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以下简称“祝文”)借西方学者查尔斯·泰勒关于“本真性”的论述,以张爱玲沦陷时期名作《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个案,对张氏小说的个人主义问题发微探幽,别有新见。该文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学术话题的敏锐,显示了作者对张爱玲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熟稔,但在具体论述中,

有些判断尚待商榷,有些结论印证了当前学界整体上的疏忽,甚至包括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问题的失判。下面聊以例释。

## 一

祝文对张爱玲和鲁迅的小说在个人主义问题上比较如下:

张爱玲从来不排除功利个人主义,而她在个人主义问题上的新发现,无疑依然与五四新文学有着继承关系,五四的经验“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在个人主义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与鲁迅小说就颇有呼应。范柳原不肯言“爱”,和《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不无相似之处,都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sup>[1]14</sup>

祝文直言“在个人主义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与鲁迅小说就颇有呼应”,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方法的内涵看,这一判断应是建立在鲁迅与张爱玲的“影响研究”而非“平行研究”基础上的。近年来,鲁迅和张爱玲的“平行研究”多被诟病,因为相关研究大多执一端而失全貌,且过于注重面相上的异同,比较结果无非是张不如鲁或张和鲁相比肩,或者在某个话题和主题上张爱玲达到了或近乎达到了鲁迅的高度,等等。在鲁、张的“影响研究”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难点时,祝宇红的判断自信十足、语出惊人,其将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颇有呼应”限定“在个人主义问题上”,可谓胆大有余而依据严重不足。

笔者以近年来阅读张爱玲论著的索录,参考古耜先生《张爱玲眼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之考证,将能发现的鲁迅和张爱玲的“影响研究”证据条列如下:

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sup>[2]</sup>

有人冒名出书,仿佛值得自矜,总是你的名字有号召力……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Q心理。<sup>[3]</sup>

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子》(依古耜先生注:作家记忆中的篇名有误,从情节看当为淑雪兼珂——今译为左琴科——的《贵家妇女》),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sup>[4]</sup>

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竟轻信清华大学书局版徐廑父序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sup>[5]</sup>

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琵琶读到鲁迅写男人也许不抵抗盗匪和蛮夷,然而妇女若是不投井投河以避强暴、倒是痛哭家门不幸。荒淫逸乐的空气里,女子的命运却与富饶土地上的穷人一样,比在礼教极端严格的国家尚且不如。<sup>[6]</sup>

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为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忙——晦气。这不过是负面的影响。<sup>[7]</sup>

中国并不富强。古书枯燥乏味。新文学也是惊惧于半个世纪的连番溃败之后方始出现,而且都揭的是自己的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但琵琶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只是反感。<sup>[8]</sup>

起先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来给她看,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不得寄回去。<sup>[9]150</sup>

他算鲁迅与许广平的年龄差别,“他们只在一起九年。好像太少了点。”<sup>[9]142</sup>

又道:“不过许广平是他的学生,鲁迅对她也还是当作一个值得爱护的青年。”他永远在分析他们的关系……<sup>[9]142</sup>

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sup>[10]</sup>

他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sup>[11]</sup>

前四则材料表明张爱玲对鲁迅的翻译和学术工作并不陌生,认可鲁迅的文笔。第五则和第六则材料,笔者曾撰文予以分析:“张爱玲通过思考祥林嫂的人生命运找到了对中国旧式人生—人性和形成这种人生—人性的根源的观照点,这也是张爱玲自《金锁记》以来持续关注女性非正常命运遭际的认知结果。张爱玲延续了鲁迅对女性的观察:当礼

教下延至乡土之后,由性引起的伤害于女性而言可导致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极限化处境。从中国新文学传统来看,张爱玲对鲁迅创作思想的这一撷取恰是‘人的文学’这一‘伟大的传统’与张爱玲自身绝望体验的结合。”拙文进一步指出鲁迅的《祝福》对张爱玲的《半生缘》的顾曼桢形象的塑造多有启示:“在‘人的文学’原点上,世俗的张爱玲有了走进伟大的鲁迅的可能。他们对礼制、对男权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均指向了中国传统和中国人的普泛劣根性。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对顾曼桢形象的塑造,显示着傲人且不服人的张爱玲从创作上做出了不为人所熟知的对鲁迅的认可与回应。”<sup>[12]</sup>第七至第十则材料,笔者亦曾撰文分析:“(此四则材料)可窥探张爱玲文学思想之斑驳陆离,所涉话题既有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主流问题、鲁迅文学的视点及人物形象塑造问题、鲁迅和许广平爱情故事。胡兰成的回忆则概括了张爱玲1940年代对鲁迅的整体理解,从侧面反映了张氏1940年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征。《小团圆》中,张氏两谈鲁迅,既有恋人之间的夸饰之词,也有借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为自己和胡兰成的感情正名之嫌,折射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文化-知识人之一对时代风潮及后来文人立人修身层面的巨大影响。……胡兰成对张爱玲文学取向的回忆总结与张爱玲自己对鲁迅的理解看似不搭调。尤其是张爱玲借成年之际的琵琶对新文学及鲁迅的‘疮疤’式书写示以极大反感,然而又为何有‘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这样的判断。上述说法看似矛盾,但实则内在地揭示了张爱玲1940至1960年代的主体经验、对人生-人性的认知与文学创作上的高度一致。”<sup>[13]</sup>最后一则材料说明孤悬海外数十年的张爱玲最终对鲁迅及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还是作出了合乎历史和文学发展实际的认可,显示出难能可贵的自我否定意识。综上所述,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确实有所呼应,但以目前发现计,也仅限于如《半生缘》等个别文本,而“在个人主义问题上”,就看不出张爱玲的小说是如何对鲁迅的小说作出呼应的。为证明这个有待商榷的结论,祝文进一步举例:“范柳原不肯言‘爱’,和《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不无相似之处,都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sup>[14]</sup>在祝文看来,范柳原不轻易言“爱”和《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灵魂、地狱有无问题均源于“个人主义问题上”的“虚无感”。范柳

原不轻易言“爱”有点个人主义因素,进而被归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勉强讲得通,但祝文就此轻易地将《祝福》关于“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三问”与个人主义扯上关系,同样归因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就太过牵强。这不是祝宇红一个人的阅读失察,而是学界多年来对《祝福》的解读多显生硬刻板及唱高调之积弊。大致看来,学界多年来对《祝福》的误读分三种情况:一是不顾字面意思,强加新意和高义;二是只看到字面意思,执其一端,不分因果或因果倒置;三是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成因过于注重外部环境和机制,而忽视了祥林嫂的主动担当及主动作为等内因。祝宇红当然未能免于俗套。弄明白了祥林嫂的命运成因问题,也就自然清楚“‘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和“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着实无关,这只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我”对祥林嫂的命运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之后的艰难的同情,谈不上是什么“虚无感”之类的归因。这当然不是祝宇红一个人的失察,而是当前鲁迅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祝福》和祥林嫂命运索解的明显疏忽。祝文之失在于以假证假,结论当然为假。

按,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坐标,所以,在当下部分学者心目中,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著述中,若不和鲁迅或多或少扯点关系,或者没有什么纵横比较的话,貌似学问就做得不深入了;还有部分学者则认为,在学术论文的撰写上,若能扯上鲁迅或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作出相关述判,则貌似高明和高深一些。这是当前学界流行病,而非某一个人的习惯,但这样牵强为文,相应风险比较大,相应失察亦屡见不鲜。再举祝文一例:“《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振保‘自欺’心理的揭发,足可以成为鲁迅《阿Q正传》之后‘精神胜利法’的又一范本。”<sup>[15]</sup>诸如此类关联,大都取乎表相相似而忽略了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其实,张爱玲和鲁迅的创作远非同一路径和格调。假张爱玲之言,即鲁迅是喜揭“疮疤”和“爱之深责之切”般的启蒙批判,而张爱玲则多沉湎于“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乱世人生启示。实质上,《红玫瑰与白玫瑰》对振保自欺心理的生动描绘,仍服务于张爱玲对变态、荒诞人生-人性形式的执迷与宣叙,小说着意呈现的是虚无、颓废的人生本相。相比之下,鲁迅谋求的则是对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劣根性施以批判,其指归在于个人的觉醒与时代、民族、国家的重建诉求。

## 二

在该文末,祝宇红谈到:“到了创作后期,张爱玲甚至进一步将个人主义立场置于现代政治现实的拷问下,呈现出无可救赎的虚无困境。”<sup>[1]16</sup>依祝文之意,张爱玲首先应对现实政治作出了明确的阐述,然后通过对现实政治的论述来砥砺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拷问”一词饶有意味,表明张爱玲的政治现实之思与个人主义立场之确乎紧密相关,且个人主义立场是张氏通过政治现实之思对之施以先验审判来建构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祝文将这一结论限定在了张爱玲的“创作后期”。自2009年以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张爱玲全集”和“张爱玲外集”系列,张爱玲创作的全貌得以恢复。所谓“创作后期”是指1955年其赴美之后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主要由改写和创作组成。改写方面,如将《金锁记》扩改为《怨女》,改《十八春》为《半生缘》,对《小艾》结局进行改写,等等。创作主要由自传体“三部曲”构成:《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包括多个剧本和中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零星散文创作。张爱玲为文最鲜明的特点即不直陈政治现实,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其相应言论亦少之又少。但在抗战及稍后的环境里,由于特定的为人与为文观,加之胡兰成对张爱玲为文别有用心的解读和引导,其为文悄然之间和时代政治纷扰有所激荡。到了“创作后期”,情况则稍有不同,《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原原本本地还原了张氏自幼时以来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将自传体“三部曲”与张氏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创作对读,可以看出,张爱玲自沦陷时期操刀文学以来,就将这些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几乎全部转化为创作资源,其中就包括呈碎片化的关于政治现实的思考。

张爱玲的文学极少涉及“政治现实”,其直言家国政治及民国大势的文字就更显得难能可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对政治现实与时代家国的有限见解是建立在对历史与文化思想走势的思考基础上的。在对近现代以来的国家主义问题分析之前,张爱玲首先对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老子》《易传》和孔子之学进行了比较:

她想找《易传》,据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所作,当时他囚于羑里,已是垂垂老矣,自信不久便会遭纣王毒手。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

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她还没读过。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老子》也不在她的课外书之列。只读过引文,终于让她找着了一本。《老子》是乱世的贤哲,而中国历史上总是乱世多于治世。孔子的学说就只有在那太平的岁月才实用。<sup>[6]272</sup>

这段话透露出几点有意义的信息,张爱玲首先明确指出《易经》讲求变通。《易经》的文化-哲学特征在于讲求变通,依照乾坤交感而生万物的道与理,讲宇宙间的诸事物依据一定的秩序永久进行、时时革新、时时变化,尤其指出物极必反的道理(按:笔者本部分关于先秦诸子哲学的理解参考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张爱玲刻意强调《易经》的成书经历,即文王在时世艰险、个体罹难情况下对个体意志进行定位和对时代作出反抗,并将这一思考哲学化而传颂至今,具有超越性特征。张爱玲的这段解读符合《易经》的文化-哲学特征。如果和当时抗战的时势联系起来,不难看出,《易经》的成书时代和抗战时势可堪相较。同在艰难时世,在个体意志与时代风潮发生碰撞和裂变之际,张爱玲轻易地放弃了家国、时代的需求而遁于个人主义的小天地。此时的张爱玲喜好于时代变局中的人生常量,《老子》被顺利带出。接下来,张氏肯定《老子》成于乱世,是先贤圣哲对乱世思考的结晶。对中国传统文化颇为用心,尤其是1955年赴美之后的张爱玲研读过大量中国文学经典,她对《老子》的思想内旨了然于心。《老子》总是在万事万物的变化中注重通则的一面,注重普遍事物的总原理,《老子》将其命名为“常”。对“常”的理解和对“常”量的重视,成为张爱玲谈论《老子》的契机:“道家面对灾祸的阴柔态度,损之而益,以输为赢,从学理渗入了平民百姓的思想。”<sup>[6]290</sup>即如何在灾祸面前维系个体、人生、民族及至家国的常量,并有效化解历史上一一次次变乱和时代危局,这都归功于道家学说的平民化之功。张爱玲认为中国历史总是乱世多于治世。她的这一认识是有偏差的,因为一个王朝总要经历治世、衰世和乱世,而治世和衰世总多于乱世。在思考了个体、民族及至家国如何通过道家思想应对乱世之后,张爱玲接着将思考置于治世和衰世时代里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对家国稳定所起到的根本性维护作用。从危局谋“变”到乱世谋“常”,再到治世谋“守”,张爱玲对中国历

史—政治在文学—哲学的投影观察是符合逻辑的。

儒家文明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带根本性的,自西汉以来,从庙堂之上到江湖民间,儒家思想宰治着中国社会的思维走势。在儒家文明的抽象道德观念中,礼占有一席之地,并且随封建社会的成长一路发展,甚至极端化。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足够的敏锐:

孔子让她想不通的地方在对礼的讲究,这么一个中庸的人真是怪异。但她渐渐明白礼对生活与统治的重要,宰治着人们,无论是家庭、部族、王国或民族。她想:只要美,我倒不介意压迫。你习惯的美有一种恰如其分,许多人看成德行。我们受压迫惯了,无论是在盛世或是乱世,而那只压迫的手总是落在女人的身上重些。这样的憧憬就是美的一部分,不就是自压迫来的?<sup>[6]272</sup>

“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粮食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sup>[13]22</sup>在封建王朝悠长的治世和衰世,孔子所代言的儒家礼教思想成为长期以来主宰中国人行为的规范性纲领,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儒家之礼被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奉为主臬。而从民间社会来看,礼异变为中国人尤其是弱者一道无法跨越的横梁,在中国民间,弱者往往成为礼教的殉葬品。张爱玲的思考重心在于:礼教作为“隐形的手”如何宰治着中国人尤其是弱者的命运,尤其是如何宰治着中国妇女的命运。在张爱玲看来,“变”与“常”都不可怕,唯有治世之“守”最为可怕。而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风靡一时,这个口号反映出时代的变革需求与传统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裂痕和那个时代人们对调和矛盾的努力。

张爱玲借其笔下主人公之口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思潮发表了看法。她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走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而对殖民时代的香港或海外华人来说,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段谈话虽在轻松调侃间完成,但却内蕴着张爱玲对近代中国社会变与常关系的思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近代中国被动性适应世界的产物,其中“中学”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固定成型以至模式化了的程式,而“西学为用”是近代中国对世界潮流形势的被动适应。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中学为体”为根基,是个体、民族、家国长期积淀而来的,是不容置疑、不可替代的。儒家的礼学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一积淀的不断延续,从而使一代代的“中学”从体制到思想层面以不断层积的方式得以发展壮大。作为圣人,孔子极具先见之明地用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方法保证了礼在内容上具有鲜活性、适应性特征。而在张爱玲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恰好丧失了这部分适应扩充性内容,这一点甚至不如日本。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受灾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清末民初,政局突变,但走向共和并未使中华民族焕发出预期生机。抗战始发,中华民族再次卷入风口浪尖上。张爱玲亲历港战,在《易经》中,她对中华民族在古代便已然发达的爱国心和近现代以来流行的国家主义别有所思。这一观察与其对中国古代道家与儒家文化的彻悟、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思一脉相承:

日本人蚕食鲸吞,爱国心也成了道德压力,她从小在离群索居的家里长大,也没能躲得开。时代要求人人奉献牺牲。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像是上学堂第一天就必须向孔子像磕头。爱国心也是她没办法相信的一个宗教。和一切宗教一样,它也是好东西,可是为它死的人加起来比所有圣战死的人还要多。她也并不是和平主义者,只是太喜欢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个国家可以百战百胜,最后仍衰亡,因为原气尽失。道家面对灾祸的阴柔态度,损之而益,以输为赢,从学理渗入了平民百姓的思想。这种怀疑论与退让说不定帮中国积攒了大量的活力,尽管几百年来人民像甘蔗一样被榨干了。

可是在国家主义的时代里一个民族没有爱国心要如何自敬自重?不犯着说我们在二世纪经历过一次,八世纪又一次,现在也走在时代的尖端。国家主义方兴未艾。拥护的人热爱它,不拥护的人渴望它。现代人谁也免不了。不起而自卫的耻辱到头来必定会夺走我们这个民族的什么。日本人来了怎么办?效法鸦片战争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sup>[6]290-291</sup>

这段话表意清晰,内容颇值得玩味。从个体成长经历看,张爱玲排斥任何带有集体目的性的活动,即使在战争期间,她对爱国心也表现出相当的疏离和拒斥。“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无兴趣。一般人念兹在兹的民族意识、国家热情,在张爱玲不能不说极为稀薄,几近于没有”<sup>[14]</sup>,这点源于张氏对中华民国时代的爱国主义能否生成持极其怀疑

态度。在张爱玲看来,战争年代里,要首先确保活着,因此应积极汲取道家思想的精华,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心态面对乱世和灾难,做到无为为之、不治治之。这些本来消极的道家思想和张爱玲在战争期间不负责任的言论相互激荡,成为其妥协为文的另一隐秘体现。究其根源,其一,因张爱玲太迷信老子及道家思想作为乱世的贤哲之用,且因妥协、自私、不负责任的战时心态,其很容易将道家思想的消极面扩散放大,老子及道家思想也一定程度上被她改造和扭曲。其二,张爱玲以自身成长经验和战争感受为依据,发现二战之际的中国恰如历史上任何战乱时代一般,天下乱与变自不是普通人和弱者可参与的,弱者在非常时代里对生命本身的渴求更强烈、更本质,且只需顺大势、随主流即足矣。或可说,张氏将二战期间中国之乱仅看成中国历史顺延过程中又一次治乱循环和改朝换代,而看不到现代政党政治体制下民族国家内在建构与成型的机制。

《易经》是张氏晚期的回忆性自传,因此,写作过程也是另一次创作,张爱玲也就能以更宏阔的视野、以稍显客观的立场来审视这场战争,以及战争暴露出来的中国问题。她明确指出,民间的爱国心应积极转变成现代中国亟需的国家主义,而中国当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国家主义观念的建立得到解决,民众不能顽固守旧、墨守成规。她的这一看法合乎时代需求和当时的中国实际。张爱玲真正忧虑的是,在中国社会民间“中学为体”的看法未发生根本改变之际,作为深藏于中国民间传统的爱国心很难真正转化为近代以来包括国家、启蒙和救亡需要的具有“西学”特点的国家主义话语。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缓慢、复杂、不平衡及暗流涌动等特点也印证了张爱玲这一忧虑并非多余。取书名为《易经》,或许暗含着张氏对因中华民族以至社会民间缺乏变通力量而产生的深重焦虑。因缺乏变通而过分持守礼教,儒教之礼在乱世束手无策,反而束缚了中华民族觉醒力量的苏醒。和其对于现实、亲情、人生等的绝望一样,张爱玲同样对现代中国的国民政府缺乏信心,对国家主义推动的现代中国自强之道不抱任何希望:

骨子里她(引者按:指主人公琵琶)是对重庆没有信心,即使南京政府仍未撤退。孙逸仙说“中华民国”必须经历三阶段人民对民主才有预备: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琵琶十二三岁的时候

听见了,那时间就不信。孙逸仙当然有他的道理,局势却不会照着走。到今天“民国”三十年了,还没有走出军政时期的迹象。即使没有对日抗战,国家仍是由军事委员长统治。谁也不愿意放弃既有的权益,单看她的父母亲就知道了。<sup>[6]291</sup>

张爱玲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爱国心以传统中国的家庭和宗族为中心,在张氏看来,中国的家族在近代以来以颓败示人,怎么可能培育爱国主义,爱国心的现代转化又从何谈起。其实,爱国主义承载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其主体正由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构成,张爱玲既看不到也不相信,甚至相当反感这点。《小团圆》这样说:“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sup>[9]56</sup>真正让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且很好地利用了“中学”资源,又对之做出了积极而重大变通的,正是张爱玲所恐惧并诀别的“毛式”革命——国家主义的内容在集体主义话语基础上得到了大一统的实现,民间的爱国心引流至具有高度统领性、号召力、组织性的集体主义话语之内,相应的保障是通过不断的思想改造,消除高度一体化过程中的任何杂音。

张爱玲对现实政治毫无热情甚至淡漠无视,但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和相应的政治视野。在对近现代以来事关民族、国家崛起的“国家主义”绝望的基础上,张爱玲对政治现实的整体判断成为其虚无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由此也不难看出,张爱玲对“国家主义”的绝望之思提供了其执迷个人主义的大背景,成为其个人主义理所当然且心安理得地发展壮大的口实。所以,张爱玲对政治现实的思考和对个人主义的坚守是相辅相成的,且内在地统一于其妥协的为人、为文底子中。“张爱玲甚至进一步将个人主义立场置于现代政治现实的拷问”这样的提法也就明显站不住脚了,因为在张爱玲这里不存在任何“拷问”的情形。事实上,考察张氏整个文学实践,她都没有把“个人主义立场”置于“政治现实”下“拷问”。

### 三

再来看祝文的又一论述:

张爱玲的小说显然在个人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在自我发现的层面更加深入,克服了五四新文学那种感伤性激情的浅尝辄止,揭示了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文化语境中,与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相伴而生的扭曲文化心理——自恋、自欺与虚无,同时也展示

了内在于个人主义之中的一种较高道德理想——在现代自我意识建立中“本真性”追求的萌芽。<sup>[1]14</sup>

该文认为,自恋、自欺和虚无是“现代转型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扭曲文化心理”<sup>[1]8</sup>。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有失察之处。自恋作为一般国民心理,深深地植根于历史,是人类自童年时代以来人之为人的本性使然。普通女子偏好照镜子化妆之类,都可说是自恋的表现,青春人爱穿几件新衣服、爱梳妆打扮,也算是自恋,都属于人之常情,说不上是什么扭曲的文化心理。当然凡事有个度,过度了就有扭曲变态之嫌。自欺作为国民的文化心理,有史可循,掩耳盗铃、掩人耳目、自欺欺人都有典可据,当然也不全是现代转型之际的扭曲文化心理。在张爱玲的文学叙事中,她只是将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作为中国现代人的基本心理给予描述,最多只是对普遍人性内容的自恋、自欺作出了富有时代感的阐发。况且自恋和自欺的文化心理内容遍布于张氏自幼时至青春以来的成长环境中,在张爱玲的自叙传文学叙事中,父亲张志潜、母亲黄逸梵以及整个走向末路的大家族无不如此;自欺欺人是其家人常态,其母黄逸梵更是自恋狂般地执迷于妆扮。所以,张爱玲对自恋、自欺等人性之常的叙写,更多来自于自身体验,和对个人主义问题的形而上之思关联不大。同时,借助于近现代以来西方小说对“有意味的形式”的强调,于张爱玲而言,在创作中借鉴西方的心理分析学说,自然关注自恋和自欺等心理内容,这都合乎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发展脉络和自身经验的文学表达选择。以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为例,心理描写也仅仅作为艺术表现手法而已,施蛰存对自欺心理的描述就和个人主义无关,张氏更将之当作半旧不新的时代中国人的隐秘心思来呈现,且并非局限于个人主义的范畴。自恋和自欺作为一般国民心理,多为创作者所重视,也较容易识别其与个人主义的似有若无、似是而非的关系。但虚无作为张爱玲文学与人生观察的最重要底子,就有必要多说几句了。

在张爱玲的人生-文学世界里,虚无是最重要的底子:“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整体审美基调;悲观也是张爱玲性格的主要基调。”<sup>[15]24</sup>作为文学思想的虚无首先源于张爱玲的人生体验。《雷峰塔》和《易经》清晰地显示,张爱玲自幼时以来的人生、情感体验决定了其一生的文学走势,尤其是其将来自于家庭、父母和胡兰成的负面情感认知几乎全部转

化为文学创作资源。当家庭破碎、亲情沦丧直接将张氏带入一生的恐惧、迷惘与威胁之中时,“世界弥漫着一股无以言之的恐怖”<sup>[15]28</sup>。在张爱玲看来,所有的感情和人生的所有努力全都靠不住,所以终其一生,她始终缺乏安全感,常人难以接近,更鲜有人能走进其内心世界。在后来操刀文学之际,张氏即于其文学叙事中一再宣叙相应的人生痛苦和不堪经历,她将自我深深限定于一己营造的悲剧氛围与情绪之中,自此再未能走出。在父女关系中,父亲的生活选择启示了张爱玲对荒诞人生-人性的体验;在母女关系中,金钱成为张氏人生的重伤,其文学叙事无不叙写人物因金钱关系而受到的伤害,为人母者因守财而伤害子女成为其文学母题之一。在这些人物身上,金钱可以诱使人轻易地越过为人者的基本底线。1944年前后,她和胡兰成的爱情行为对其为人为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胡得意之际正是张爱玲创作上那些乱世求个人现世之“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人性观指导下的文学大行其道之时。遗憾的是,张爱玲非但没有从她和胡兰成绝望的感情、失败的婚姻中升华出更深层次的具有崇高品质的文学作品,反而将个人俗世主义安稳、妥协的人生卑微诉求作破产化处理,并导向悲剧性的虚无、颓废及绝望,进而将其一再哲学化、本质化、偏至化,如《半生缘》等就具有张氏以往作品无法超越的颓废、虚无意识。正是基于上述亲情、爱情及家族生存体验,张氏看不到其成长环境中现代国家、民族、共和、革命等这些“革命”性力量。她切切实实地生活在一个虚无而绝望的环境里,在长达60余年的文字世界里,她反复叙写的也是自己带本质性的虚无体验。

其次,从文学传统来看,张爱玲借助中国古典虚无主义文学传统,将魏晋、南朝、晚唐的颓废,明清以来的《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有关虚无之思原原本本地置放于民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回到传统文学中寻找灵感启发和表达手法,张爱玲在话语层次上同时定义了现代化本土语言的政治和文化含义。对于一个深谙五四文学的现代读者来说,张爱玲小说语言所运用的措辞和叙述语气呈现的是一套遥远的指代体系,而这种叙事风格是诸如《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小说才具备的特色。”<sup>[16]</sup>这“一套遥远的指代体系”正是中国古典虚无主义文学传统及相应谱系。加之张爱玲倾心于西方世纪末文学的颓废、虚无,其



文学也就借助于对民国时代的旧家族衰落、颓败描述,一再实录高门巨族衰颓过程中的虚无人生与人性,再三放大其对末世人生、人性的悲剧及颓废体验,最终形成对整体民国时代新旧人物的全面否定。当个人、国民性、启蒙、救亡、革命等时代主潮被张氏轻易地放弃并自动疏离之际,张氏执迷的虚无主义人生—文学就太轻易地和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拉开了距离。祝文强调“作为现代性症候的虚无主义,本身是对世俗文化范畴的挑战,经由尼采揭发出来,在20世纪之后却被发展成一种批判模式”<sup>[1]12</sup>,即使这一结论成立,张爱玲的文学与人生所继承和阐发的也并不是作为批判模式的现代性十足的虚无主义。这种重在抒发一种刻骨的生命感怀的虚无主义,其实是中国古典《红楼梦》式的,而非现代尼采式的。

以此看来,张爱玲的虚无体验主要来源于其自幼时以来的成长体验,中国古典虚无主义文学传统、西方“世纪末的颓废”以及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文学提供了其虚无主义形成的思想背景,抗战“围城”等战时体验则为其虚无主义的人性论述——文学实践提供了足够的生成空间。所以,张爱玲的虚无感可远溯中国古典虚无主义传统,下达香港战时生存经验及与胡兰成的情感体验,其并不是简单、笼统又抽象的“现代转型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扭曲文化心理”。而虚无主义本身也并不只是在现代时期与“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相伴相生”的,实古已有之,此早为常谈。

“张爱玲小说中的个人主义”内容毫无疑问源于张爱玲的个人主义,在没有中肯有效地梳理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生成及发展的情形下,仅借助于两篇小说和个别西学理论概念推演“张爱玲小说中的个人主义”,实在不得要领,相应结论也多有商榷余地,甚至不无讹误。要真正说清楚张爱玲小说中的个人主义问题,必须清楚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生成、发展及表现形式。大体说来,张氏的个人主义来源,从文学、思想传统来看,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虚无主义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的文学”观及五四之后的个人主义思潮,也有世界文学尤其是20世纪文学的人本主义思潮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影响。从张爱玲文学的创作资源来看,其晚期文学的自叙传小说所提供的,正是个人主义如何从其

幼时及至青春以来的家族、亲情和爱情的点滴体验中逐渐偏至且极端化发展而来。张爱玲的个人主义见解更多地夹杂在其妥协、虚无、颓废等体验的抒发中,亦如前述,甚或杂有对近现代以来国家主义的绝望判断。

### 参考文献:

- [1] 祝宇红. 张爱玲小说中的个人主义探寻[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3).
- [2] 张爱玲. 忆胡适之[M]//张爱玲. 重访边城.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14.
- [3] 张爱玲. 关于《笑声泪痕》[M]//张爱玲. 重访边城.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117.
- [4] 张爱玲. 谈吃与画饼充饥[M]//张爱玲. 重访边城.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140.
- [5] 张爱玲.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M]//韩邦庆. 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记·2. 张爱玲, 注释.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339.
- [6] 张爱玲. 易经[M]. 赵丕慧, 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
- [7] 张爱玲. 四十而不惑[M]//张爱玲. 重访边城.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247.
- [8] 张爱玲. 雷峰塔[M]. 赵丕慧, 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347-348.
- [9] 张爱玲. 小团圆[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 [10] 胡兰成. 山河岁月[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204.
- [11] 水晶. 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 台北:台北大地出版社, 1973:20.
- [12] 程小强. “影响研究”视域下的鲁迅与张爱玲[J]. 鲁迅研究月刊, 2014(2):68.
- [13] 程小强. 论张爱玲对鲁迅及新文学传统的“偏至”说:张爱玲与鲁迅的“影响研究”[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6(4):88.
- [14] 张均. 张爱玲十五讲[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82.
- [15] 陈安琪. 蹙眉打量残缺的人生: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8(6).
- [16] 黄心村. 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169.

责任编辑:黄声波